

北京口述历史丛书

并不遥远的 记忆

北京口述
历史丛书

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◎编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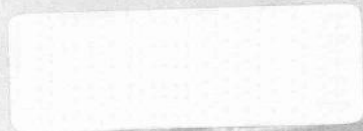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口述历史丛书

并不遥远的 记忆

北京口述
历史丛书

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◎编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并不遥远的记忆/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.

—北京: 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073-3191-2

(北京口述历史丛书)

I. ①并… II. ①中…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
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3803 号

北京口述历史丛书：并不遥远的记忆

编 者/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

责任编辑/孙 翊

装帧设计/欧阳显根

出版发行/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/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
邮 编/100017

经 销/新华书店

销售热线/63097018

排 版/北京方方照排中心

印 刷/北京新魏印刷厂

680×1000mm 1/16 24.5 印张 296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73-3191-2 定价:5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编者的话

人们常说：岁月消磨不了记忆。这句话作为一种感慨，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是可以的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岁月是可以消磨、尘封甚至淹没记忆的。

原因何在？不言自明。记录在纸张上的档案、资料，保护不当，会有分散和遗失。即使是刻在石版上的经文，可以躲过水淹火焚，却躲不过冰霜雨雪和风化的剥蚀。保存在人们脑中的记忆，更是随着人体机能的退化，记得的越来越少，忘却的越来越多；记得准确的越来越少，误记错记的越来越多。这是自然的辩证法，是无可更改的规律。

人类的进步，建立在一辈辈的繁衍、一代代的知识积累之上。因此，经验的归纳、教训的总结、智慧的传承是必不可少的。人们把凝聚在物质上的历史称之为“人类物质文化遗产”；把记载在纸张上（现在又有了很多新的电子保存手段）的历史称为“历史文献或档案”；更重要的，还有一部分历史，他们存在于健在的当事人头脑之中，通过他们的口，这些历史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再现，我们把这种历史称之为：口述历史。

在历史学的发展上，口述历史曾经占有极其广阔、长久的地位。结绳系事，口述歌颂，曾经是许许多多民族曙光初现时的第一章。在现代和当代的历史中，口述历史仍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。

一下子扯远了，从研究北京历史的角度来看：

口述史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，有时甚至是历史链条



并不遥远的记忆 BINGBUYAOYUANDEJIYI

中唯一的环节。如中共作为革命党的时候，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，为夺取政权所从事的活动，很多地方、很多时间是在“非法”的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，党内文件和记录被查获，会立刻引来杀身之祸。所以，那时人员的组织关系往往是单线联系，那时的行动计划和方案往往都是口耳相传，没有文字记载。即使有，很多的珍贵文字材料也都毁弃于战火之中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党创建的过程，地下斗争的许多事迹，都来自当事人经年之后的追忆。

口述史有鲜活的特色。比较计划、总结、纲领、宣言而言，口述史可能没有那么的周全，那么的字斟句酌。但因为口述者都是亲历者，在表述过程时描绘的场景，流露出来的个人感情，会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，拉近我们和过往历史的距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青年学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豪情，在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者口中道来，依然使我们经受着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。

口述史揭示着内幕。历史的发生都是在具体的地点、时间范围之内，该时该刻，亲身经历的人是有限的，要澄清历史真相，亟待当事人的回忆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地下党情报工作、定都北京的经过、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细节、改革开放决策的制定……随便撷取几例便可知晓，没有亲历者的回忆，没有口述的记载，恐怕后人读史时，会失去了几分色彩。

口述史的记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。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，一是口述者，一是记录者。口述者难在要有健康的头脑和身体，要有资料的准备，要有客观的分析，要有不改事情原委的勇气。实在的说，回忆也是一桩痛苦的事，谁不是记取失败和教训比成功和欢乐更深刻呢？记录者难在采访前的准备，难在提问纲目的梳理，难在被动的等待，难在事后的整理、难在知识面的不足等等。尽管如此，几十年来，北京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回忆专辑，社会主

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口述材料也在不断地整理和披露出来。这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得益于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，也得益于录音录像等设备的使用和普及。

口述史的编写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。20世纪80年代，曾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，把征集口述史叫做“抢救活资料”。多亏了那时的工作，把不少涉及解放战争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土地革命时期、大革命时期、建党时期，甚至“五四”时期的亲见、亲历、亲闻记录下来、抢救下来。当我们刚松一口气，却又发现新中国成立时的小伙子、改革开放时期的部门领导，如今竟也七八十岁了。岁月如梭，时不我待，抢救还须继续。

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这套《北京口述历史丛书》，目的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，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，把那些曾经参与过相关历史活动的老同志、当事人、知情者的回忆口述集中起来，作为历史档案的印证、补充和参考。用确凿的事实，生动的语言、具体的感受去复述过去的那段历史，从建党到现在；去重拾那些故事，从工农商、科教文卫的发展到名人与百姓中的奇闻逸事；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，不论是平淡还是激昂，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。

口述史的组织、采访、撰写、编辑、出版尚处于摸索的阶段，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铺路者的工作，因为历史的瑰宝不能遗失，因为读者和听众在期望，因为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。

当时光又过去了几十年、上百年，当我们都已不在的时候，我们的声音还在，我们的容貌还在，我们的记录还在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讲述的历史真实还在，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呀！

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！

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

2007年夏

目 录

从容忆往

柴泽民 / 003

布热津斯基对我的评价很高：“8月中，我第一次会见中国联络处新的主任柴泽民大使。虽然柴的形象使我联想到玩具熊的样子，但结果证明他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、坚韧而干练的谈判对手。会见时，他总是掏出一个小小本本，照本宣科一通，然后加以发挥。中美之间建立了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新关系，这应归功于柴泽民和韩叙这两位大使。”

往事回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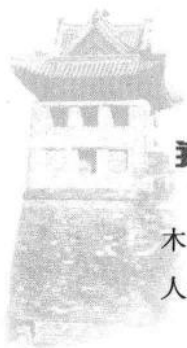
陈 度 / 071

抗美援朝时，从大连送来几辆货车需要修理。那时正是春天乍暖还寒时，早上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发现有许多飞虫围着货车飞。当时正传说美帝国主义散发细菌，大家立刻警惕起来。我派人堵在厂门口不让工人进厂上班，并带人捉了几只飞虫，送到城里有关单位鉴定，还请免疫部门派人来消毒。

人生经霜始绚丽

宋 汀 / 131

五队是一个女生队，有几十人，很多领导人的爱人都是五队的。像邓小平同志的爱人卓琳（浦琼英）和卓琳的大姐浦代英、二姐雷迅（浦石英），陈云同志的爱人于若



并不遥远的记忆 BINGBUYAORYUANDEJIYI

木、于若木妹妹于陆琳，李维汉后来的爱人吴景之，文化人士吴亮平的爱人杜凌远、胡乔木的两个妹妹都是五队的。

北京记忆

刘冰 / 195

毛远新念毛主席的批示：“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。我看信的动机不纯，想打倒迟群和小谢。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。我在北京，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，还要经小平转。小平偏袒刘冰。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。”

此时我的感觉真如晴天霹雳，几乎完全陷入思维混乱的地步。

真诚面对人生

张廉云 / 259

因为民革成员的特点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人，还有一些文化名人，所以划定的“右派”一般都是“大右派”，譬如国民党原立委谭惕吾、《新民晚报》的陈铭德、周颖、原北平市长刘瑶璋、政治活动家甘祠森等等。这些人的平反，影响很大。

志元记叙

孟志元 / 327

万里同志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曾在国家城市建设部任职，了解给排水研究所的沿革变迁。他告诉我，给排水研究所窝着一批技术人才，都是名牌院校出来的，还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；大部分都是工程师，包括博士、研究员。经历了单位下放、人员疏散，面临着人才流失，太可惜了。我们可以把它要过来，改建成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。



柴泽民 1916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。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学毕业后曾做过小学教员，办过报纸、杂志。抗战后，投笔从戎，组建抗日武装，曾任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抗日游击队政治主任、康杰支队政委等职。1941年，任太岳军区第五、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、司令员。

1948年11月，任北平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。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任北平郊区工作委员会书记。1950年，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。1952年起，兼任北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北京市体委主任、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等职。1955年，被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交通工作部、地方工业部部长。

1961年初，任驻匈牙利大使。1964年，任驻几内亚大使。1970年，任驻埃及大使。1974年，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。1975年，任驻泰国首任大使。1978年任驻美联络处主任、首任驻美大使。1983年，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。

1978年起，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副主任。现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文化研究会理事长、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、欧美同学基金会理事长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、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、世界语之友会会长、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等职。

从容忆往

柴泽民

少小立志为革命

我于1916年10月18日出生在山西运城闻喜县一个贫民家庭。山西运城，曾经哺育过商鞅、关羽、司马光、柳宗元、王勃、关汉卿等不胜枚举的历代豪杰名流和文人墨客；曾哺育过彭真、程子华、姬鹏飞、傅作义、董其武、李雪峰等众多革命先辈与仁人志士。我所在的运城闻喜县则善于经商、长于理财。闻喜人办的钱庄、商号，自道光年间就出现在全国各大商埠，如北京的晋镒钱庄、开封的天成金店，四川的广顺、长生、魁盛、元兴等商号，都雄踞一方。我的父亲因为家贫，五亩旱地养活不了全家人，只得千里迢迢走四川，在重庆一家商店作学徒。父亲原在老家娶妻生有一子柴恕，不幸妻早亡。在重庆当学徒后，父亲娶了沙坪坝的一家刘姓姑娘为妻，生有三男一女。民国之后，四川战乱不断，父母只得带着两个男孩



并不遥远的记忆 BINGBUYAOYUANDANJIYI

一个女孩从天府之国回到三晋大地的老家。可惜父亲回家不久便身染大病，一病不起，留下一个遗腹子就撒手人寰。

我是遗腹子。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柴恕小时读书着了迷，一心要上山修道成仙，出去后就再没回来。我的两个哥哥因为家贫，都没读什么书，早早就离家出外谋生，二哥柴愚先到太原当学徒，后又跑去陕西当兵，又经人介绍加入冯玉祥在耀县办的三民主义军官学校学习，毕业后到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做文书。西北军穷，经常发不出饷，他只好去饭馆管账，这样东奔西跑混了一辈子。三哥柴喜跑去四川到康定当学徒，靠贩卖药材为生。姐姐很小就出嫁，婆婆家境不好，公公在杨虎城十七路军 42 师军械处当处长，姐夫李剑豪原在闻喜当督学，后去陕西，他抽鸦片，是个“瘾君子”。姐姐身体不好，出嫁后不久便去世。



柴泽民母亲

我原名柴金生，又名柴恩，现在的名字是后来上学取的。我出生后，家里负担更重，哥哥们和姐姐比我大很多，虽然外出谋生或出嫁，但自己生活很艰难，根本无法接济家里。我和母亲相依为命，靠出租五亩旱地收一点地租、借贷或变卖，勉强为生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有着许多传统美德的女性。在旧社会，她一个寡母，带着年幼的我，坚强而勤劳，一生勤劳俭朴，非常爱自己的子女，与乡邻和睦，独立自主，不趋炎附势。她是我最初的做人的基本教科书，她不仅养育了我，教我怎么做人，也成了鼓励我革命奋斗到底的动力。

虽然家贫，母亲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我送去学校读书。7

岁那年，母亲送我到闻喜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。12岁那年，也就是1928年，在100多位考生中，我以第4名的成绩考入闻喜中学第一附属高等小学23班。

1930年，我考入闻喜中学。在众多功课中，我对文学和历史情有独钟，喜欢与同学探讨社会人生问题。1932年，闻喜中学掀起驱赶校长任成德的学潮，此前，闻喜中学曾有过三次学潮，我都没赶上。这次，16岁的我积极投入到学潮中，联络全校师生将这次学潮由乡派斗争（东乡学生反对南乡的校长，南乡学生支持南乡的校长）转变为反腐败、压迫学生的斗争。通过这次斗争，我认识到有的学潮其实是少数人搞宗派斗争，不能盲目被这些人利用，要善于分析。

1933年初，我从一个进步青年那里接触到《北斗》、《共产国际》、《布尔什维克》、《北方红旗》等革命刊物时，我感到世界向我开启了一扇新窗。中学毕业后，家境贫困，我无力继续求学，只好在本县一所小学任教谋生。在此期间，我与一些进步教师发起成立了进步团体——“反帝大同盟”，积极主张和宣传抗日，反对不抵抗主义，并抵制和反对当局对进步力量的压制与迫害。在这个团体的影响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举行了反对小学教员的鉴定斗争、闻喜中学反对会考的斗争。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考验，1933年10月，我被光荣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距我提出入党要求只有半年时间。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席荆山，我向他提出入党时，他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？”



席荆山

我脱口而出：“参加革命，我不怕死！”

席随即反问：“参加共产党就是为了死吗？”这一下，可把我问住了。

席解释说：“革命是为活，不是为死。由于地主、资本家压迫、剥削工农大众，他们无法活下去，才起来革命，才起来反抗。为了活，更好地活，我们才参加革命。当然，参加共产党也有被杀害的可能性，做一个革命者也要有不怕死的精神，这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。”

席荆山的这席话使我豁然开朗，现在都还记得。

逃到西安继续革命

1934年，受党组织的指派，我去运城师范学习，恢复遭到破坏的教师联盟、社科联盟，积极倡导进步运动。1935年4月初，清明节前夕，闻喜县中学“读书会”负责人宁复吉被捕叛变，供出一批党员及“反帝大同盟”盟员，未参加任何组织的进步学生也被无辜牵连。中小学教员中的党员阎家德、任保家、沈全成、王建兑、张佩璜，盟员孙哲庭、刘复之，进步学生贾启允，国民党左派党员温枕流等都被捕。

4月5日清明节前一天，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带上借来的进步书籍回闻喜县城上坟和看望母亲。到小郭村的途中，遇见身穿政府工作人员制服的闻喜县四区助理员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们边骑边聊天。他突然神秘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县里出大事了！县里抓了好多共产党员。”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再试探性地多问他具体问题，他都说不知道。我心底犹豫起来，我该不该回学校？回去的话，有可能自投罗网，因为我平时很活跃，被捕的人都认识我。不回去的话，我又不了解具体情况。想了又想，母亲肯定在家为我担惊受怕，我还是先回家看看。

可带的这些书怎么处理？丢了不舍得，最后还是决定冒险带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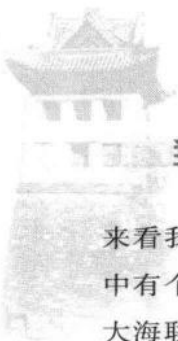
我骑着车，后来又遇到高小的同学，跟他一求证，果然，因为“读书会”抓了很多入。我赶紧绕道回家，母亲看到我大吃一惊，马上催促我离开，抓了两个清明节祭祖的“枣蛋”放我书包里，哭着说：“家里没钱，你自己想法子找地方躲起来。只要过了黄河就安全了。”

迫不得已，我只得离开学校，在县汽车站我遇到了同样逃出抓捕的席荆山。我们去陕西华阴县农具厂找我的姐夫李剑豪，看他能否帮忙找工作，李剑豪在闻喜做过督学，与席荆山相熟，但李剑豪对我们十分冷淡，说华阴找不到工作，要我们去西安。

我们到西安仍然找不到工作。席决定去甘肃，我只好再去找姐夫。第二次又到华阴，姐夫训了我一顿，他抽鸦片，不仅不给我钱，还要我给他钱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将借来的五块大洋给了他。他一时高兴，还带我上华山赶了一次庙会，尽管那时我为生活和出路忧心忡忡，但险峻的华山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两天后，姐夫带我去找他在42师军械处的父亲，看能不能找一份工作。我这时才想起我二哥也在42师一个营里当文书，于是跟着去了驻地大荔县，最后给我补了个看护兵，要我去三原县等缺。等了三个月，也没补上。这时，刚好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军医处在西安办军医训练班，要从部队招考一批老护士，我因为有文化基础，学过外语、生物等课程，顺利考上了军医班。

军医班的伙食由公家负担，每月还可领7块大洋。生活一有着落，我就开始找党的关系。运城师范的同学李艳河，此时正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当兵，他知道我到后，便从驻地三原县赶



并不遥远的记忆 BINGBUYAOUYUANDEJIYI

来看我。我们重逢在西安，非常兴奋，他跟我说军医处卫生队中有个班长彭大海是党员，他已跟彭大海介绍了我。我可和彭大海联系，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扩大影响，根据情况输送一些党员或进步青年到部队中来。

这一段，我从一朋友那里偶然接触到世界语，便萌发了学习这门新语言的热情，当时很多人不懂世界语，用世界语搞秘密工作、传递信息，对我们搞革命工作，尤其做地下工作很有好处。因此，我白天在训练班上课，晚上就学习世界语，还在《工商日报》上创办副刊“我们的语言”，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、新的世界观。我还带着训练班的学员晚上一块学世界语，军医处处长便把训练班集合起来训话：“你们这些穷小子，学好医，一辈子饭碗都保住了，还想学什么世界语作外交官！以后不准再学！”没想到，他还真说对了，我20多年后还真当了外交官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去西安，还去看这位军医处处长，他已经离开部队，是西安市工商联主任了，他开玩笑说：“被我说中了吧，我有预见性。”

与此同时，我约了两位朋友，创办了《更生》半月刊，反映腐败现实、民众苦难，宣传抗日主张。1936年7月，我因《更生》稿件被捕，被押送到绥靖公署军法处，被投入又脏又臭的牢房，脚上戴着最重的八斤重脚镣。牢房对我逼供信，我死活不改口，只说自己是学医的，根本不知道共产党，投稿只是为补充生活不足，完全不知道这犯法。他们没法，只好把我押送去西北剿匪司令部军法处。军法处的法官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，同情抗日，我向他解释自己学世界语是公开合法的，我不是共产党，不是共青团，不是左翼联盟组织。法官只是笑了笑，宣判我无罪释放，对《更生》发行人樊仰山以违背出版法罚款释放。樊仰山后来告诉我，《更生》筹办款是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。

出狱的当天晚上，我找到彭大海，向他汇报了被捕的经过和三个多月的监狱生活。他肯定了我狱中的表现。我出狱后回到军医班，依然宣扬世界语。此时正值世界语创始 50 周年，我写了两篇稿件，还约了两篇稿件，凑了四篇稿件登满一版，发在张学良的《西安晚报》纪念专刊上。



1996 年，
柴泽民(左六)
出席全国世界
语协会成立
55 周年

在军医班亲历西安事变

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四五点，我和同学们被一阵阵激烈的枪声惊醒。天亮后，枪声也停了，我们想出去看看，却发现大街上早已戒了严。我们爬墙往外看，发现街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十七路军官兵。我们军医班在新城北门外军医处，9 点钟左右，我们看见一辆军车开来，要进新城，十七路军不让进。军车上的东北军说，我们抓了蒋介石，要送到新城大楼。他们听了，拥在街上，欢呼雀跃，高兴极了。不久，国民党宣传部长因为被打伤送到军医处来疗伤。

12 月 16 日，中山公园召开西安民众大会，两万多群众参